

## 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诸问题探究\*

王金岩

**内容提要** 政治重建是确立战后利比亚国家属性和发展定位的核心议题。卡扎菲政权垮台两年有余，利比亚政治重建进程却裹足不前、徘徊不定，仍处于初创和起步阶段。一方面，利比亚国内各地区（部落）以及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在国家建构、制度安排和利益分割上缠斗不休，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威权政权垮台和西方新干涉主义后的遗症效应，导致利比亚国内极端势力肆虐，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利比亚战后重建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建立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政治包容性是衡量政治重建进展的关键要素。由此看，利比亚政治重建与政治转型仍面临严峻挑战，前景充满变数。

**关键词** 政治重建 利比亚 稳定 发展

**作者简介** 王金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国家重建”通常指一个国家在获得独立或者经历了战争、内乱、外国干涉或政治动荡后其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尤其是国家机器的重新建立或国家政权的巩固。<sup>①</sup>2011年8月，随着穆阿迈尔·卡扎菲独裁政权在战争中垮台，利比亚国家重建随即被提上日程。利比亚重建既包括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物质领域的恢复和建设，也包括国家政权的重构和各项制度的创设。其中，政治

---

\*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林聪研究员对本文的指导。

① 江涛著：《后冲突时代的秩序重塑：美国在海外的国家重建行动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重建是整个重建进程中的关键步骤，是开启国家全面重建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近 3 年来，政治重建步履维艰，进程曲折。2014 年 3 月以来，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一职的频繁换人再次充分暴露其政局之动荡。本文拟围绕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诸问题及其原因展开分析。

## 利比亚政治重建的核心议题

战后的利比亚，权力分散，制度残缺，首先面临选择政治发展模式的紧迫问题，其核心是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并依靠稳定、高效的政府为国家的发展创造制度基础、文化基础、民族基础和心理基础。当前，利比亚国内各派别、各政党及其所代表的各方势力就国家政治重建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核心议题在于国家组织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三方面。

### （一）关于国家组织形式

利比亚领土由 3 个区块组成：以班加西为中心的东部昔兰尼加地区、以黎波里为中心的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和南部的费赞地区。三地间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氛围都有很大差异，且相互间缺乏紧密联系，难以接受统一管理。卡扎菲统治时期，国家处于强人高压下的形式上的统一，而卡扎菲长期采取的偏颇统治进一步导致三地发展失衡，民众难以同心。由此，3 个地区民众对于利比亚战后新国家的组织形式意见不一。

2011 年 8 月，当时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把革命的总部由班加西迁至的黎波里，后者继续作为战后新国家的首都。对此，西部地区民众表示满意，并支持单一制国家形式。东部民众却表示不满，要求改行联邦制，当前已成立自治政府管理地区事务，仅在外交和国防上听命于中央政府。南部的一些部落则不满于国家对其保护不力，谋求独立。可见，利比亚国内对战后国家的组织形式存在争论：单一制、联邦制，或是国家分裂？

那么，利比亚有可能采用何种国家组织形式呢？虽然利比亚的国家凝聚力不强，但在独立后的 60 多年里已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国家认同，其国内已具备同质性。无论是依据战后的现实民意，还是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需要考虑，单一制国家形式可能更适合战后利比亚的重建与发展。

首先，从利比亚的现实民意看，战后有民调显示，占利比亚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西部地区一致支持国家统一。东部地区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 30%，

且拥有丰富的能源储藏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才。这里虽然已实行自治，但支持统一的国家形式。拥有 20 万人口的利比亚东部阿古里部落长老在战后曾公开表示：“只有一个利比亚，我们所有人都会接受国家的分裂。”<sup>①</sup>南部费赞地区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5%，虽然其中不乏要求独立的声音，但只局限于一两个部落，占总人口比重很小，且临时政府多次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使得独立要求未能实现。显然，单一制国家形式是当前利比亚的主体民心所向。<sup>②</sup>其次，从国家发展视角来看，单一制形式更符合利比亚国情，既有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也有利于从整体上调配资源，有利于开展经济建设。

综上，单一制国家形式既有利于利比亚国家的重建与发展，也是主体民心所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利比亚政局不稳、动荡不安，尤其是恐怖势力在其境内的发展壮大使其依然面临分裂风险。

## （二）关于政权组织形式

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堪称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没有政党、议会等现代政治机构，其战后政治重建必然面临对政权组织形式的重新选择。更为严重的是，卡扎菲执政期间依靠部落统治在其国内遗留下深重的部落观念和部落意识，对战后利比亚政权组织形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利比亚战后强人霸权崩塌，各股势力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难以调和，且都致力于对国家统治权的争夺，遂出现国内各派势力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激烈争论和博弈。

首先是部落博弈。利比亚国内有大大小小数百个部落，较大规模的有 130 多个。各部落自成一体，都竭力争取在战后新国家获得利益最大化和对国家的领导权。但从当前情况看，没有一个部落能够成为全体国民共同服从的领导部落，部落制也不可能成为战后利比亚的政权组织形式，这既不符合利比亚当前国情，又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且与当代世界上通行的主流政权组织形式相违背。其次是政党争权。利比亚战后党禁的开放使众多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政党成立的背景和目的看，大多具备资格参与党派角逐，以争夺对战后新政府的领导权；从政党力量看，这些政党大多为战后仓促组建，

<sup>①</sup> Kamel Abdallah, "Tribes and Abductions", *Al-Ahram*, No. 1183, 6 February, 2014.

<sup>②</sup> 王金岩：《利比亚政治中的部落因素》（博士论文），2013 年 6 月，第 91 页。

既无严密组织，也不具备完善的施政纲领和统一的发展目标，更谈不到执政经验。可以说，当前没有一个党派或组织有能力独立领导整个国家。此外，利比亚战后国内多种势力并存，有最先举起“倒卡”大旗的伊德里斯王室后裔，有战争中倒戈的前政权高官，有前政权残余势力，有割据一方的民兵组织，也有伊斯兰势力，甚至还有趁乱混入的恐怖势力，各种势力以各种方式对利比亚新政权展开激烈争夺。这使得战后“大伤元气”的利比亚受到进一步削弱和消耗，为国家的重建增加难度，延长时间。

通常情况下，国家组织形式影响政权组织形式的选择，但后者也有相对独立性。纵观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进程，概览当代世界政权组织形式的主体潮流，利比亚将采取政党政治方式，而非其原有的强人霸权以及部落等级制度。依据其现实情况判断，在当前乱局下的利比亚，一党制不具可行性，只能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共同领导国家建设。而各派间的协商与妥协，以及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都尚需时日。

### （三）关于国家发展道路

战后利比亚政党林立，派别繁多，为选择统一的发展道路增加了难度，在这方面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世俗化与伊斯兰道路间的调和与选择。一方面，在推翻卡扎菲政权过程中，伊斯兰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中的“反对派”武装中约30%来自于伊斯兰组织，且最先攻入的黎波里，<sup>①</sup>由此利比亚战后伊斯兰力量得以提升。在2012年的战后首次大选中，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公正与建设党”在80个政党席位中，获得17席，仅次于具有世俗主义倾向的党派联盟“全国力量联盟”（39席），居候选政党的第二位。因此，伊斯兰力量将是利比亚未来发展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伊斯兰政治派别在该国的根基较弱，穆斯林兄弟会长期流亡海外，在利比亚境内没有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当前又受到埃及穆尔西下台的消极影响，且利比亚的伊斯兰组织内部众派别间也存在矛盾分歧。因此，伊斯兰主义对当前利比亚的影响力尚有限，但是已显现出逐步强势的迹象。<sup>②</sup>

另一方面，曾长期受宗教统治压制的利比亚民众向往世俗化民主。卡扎菲笃信伊斯兰教，甚至认为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能在《古兰经》中找到答

<sup>①</sup> EIU, *Country Report: Libya*, October 2012, p. 21.

<sup>②</sup> 参见王金岩：《利比亚，仍然需要耐心》，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2期，第40页。

案。他统治利比亚的数十年间，以宗教法令和民主审议的方式治理国家。然而，这种方式存在明显的弊端，例如，宗教法令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各领域问题的解决方法，导致一些方面法律法规的缺失带来管理的盲点；又如，民主审议的方式缺乏现实应用性。受伊斯兰教法统治 40 余年的利比亚民众渴望追赶并融入世俗化的世界主流和趋势。

从总体看，利比亚的伊斯兰组织和世俗派别在政治发展方向上并无本质分歧，他们都强调伊斯兰教法的地位，支持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并反对恐怖主义。实际上，利比亚正走上一条介乎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但是，由于利比亚当前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政府统治乏力，伊斯兰极端势力趁乱潜入，趁机作乱。客观看待利比亚的伊斯兰势力，需要区别伊斯兰派别与极端恐怖组织。

当前，利比亚国内关于国家战后政治重建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上三方面。此外，外部因素也将对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产生一定影响。毕竟，“倒卡”战争的胜利是在北约战机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甚至可以说后者对利比亚战争的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利比亚战后重建必然会受到西方意图的制约。美、法等西方大国出于国际压力、国内实力等原因，没有直接参与利比亚战后的政治重建，但他们积极参与其他方面的重建，甚至从战争尚未全面结束时已着力抢占利比亚重建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帮助利比亚组建军队和培训军人，投资并承接利比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能源领域的重大项目等，以此既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又对利比亚其他方面的重建施加一定影响。显而易见，战后利比亚的重建与发展都将受到西方大国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受制于他们的意志，此乃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外溢效应。

## 利比亚政治重建的特点

2011 年 10 月，利比亚战时“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此后的 20 个月系新政权的过渡期，并列出政治过渡时间表。但既定计划在此后的实施过程中多次被推迟，一些步骤数次反复，政治过渡至今尚未完成。利比亚政治重建的实质为通过建立国家权力机构和制宪使国家逐渐步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当前利比亚国内的现实情况显示：国家尚未摆脱软政府乱社会的魔咒：新政府统治乏力，社会充斥着厮杀、混战，预期民主未能实现，

民怨越积越深，境内充满武装恐怖分子的威胁。一言蔽之，利比亚正在遭受以激进方式推动政权更迭留下的后遗症的折磨，政治重建进程举步维艰。

解读利比亚政治重建的特点必然离不开对其客观国情的了解。政治上，利比亚战前40余年都采取形式大于实质的人民大会制度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权力架构体系，没有宪法、议会等当代政治要素，战后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制度创设，都始于零起点。经济上，以能源出口收入为支柱的单一经济体制带来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对外受到国际油价和外交关系的制约，对内受到国内政治、安全局势的深刻影响。此外，利比亚国家凝聚力不强、部落属性犹存等社会特质不容忽视，这直接导致其在强人政治退去后强社会弱国家的特性。统观近3年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 （一）重建主导力量分散

战后利比亚，虽然存在分裂呼声，但如前所述，绝大多数民众已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了稳定的国家认同，统一的国家形式没有改变。但是，国家权威的运行却呈现碎片化，当前的利比亚社会堪称一个社会组织的大杂烩：地区间角力，民兵武装混战，部落冲突不断，且与政党政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在不同于国家所提倡的规则下运作。在这种情况下，不服从并非简单是个人失范、犯罪或腐败，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冲突，即应由哪个组织制定规则，这在利比亚战后重建中体现为重建主导力量的分散。

利比亚战后，曾在战争中团结一致、齐力“倒卡”的反对派分崩离析，且都以国家的功臣自居，希望获得对新国家统治的主导权，遂出现国内各派势力对国家政治重建主导权的激烈争夺。他们中既有老王朝后裔，也有倒戈的卡扎菲政权高官，还有各地民兵组织及众部落力量，既包括世俗派群体，也有伊斯兰组织，甚至还有趁乱潜入的极端势力。由于出身和经历差异，他们自身的素质、能力参差不齐，政治目标也各自不同，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都以实现本集团利益为目的，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整体利益。

利比亚过渡政权由以上各类人群的代表组成，来自全国各个地区。他们作为利比亚重建的主导力量，显然缺乏向心力，他们主导下的利比亚政治重建必然目标分散，分歧丛生，难以齐心协力。

#### （二）重建目标模糊不清

利比亚战前采取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众国体制，实质上则是处于强人及其家族的霸权统治之下，无论是国家机构设置、政治制度，还是外交政

策，无不显示出卡扎菲的特立独行和高压统治。当强人霸权崩塌，国家面临政治重建，必然会出现如下问题：首先，利比亚的政权更迭缘于国内多种力量对其前政权统治的不满，而将其推翻。而且，其原有的政治制度及统治方式不具进步性，也不能与时俱进，因此新政权不可能延续前朝统治，而必须选定新的政治目标。其次，战后利比亚派别众多，各为一己之私争斗不休。重建主导力量分散必然造成目标的不一致。伊斯兰政党要求明确国家的伊斯兰属性，遵循宗教法令治理国家；“海归”派领导者推崇宪政民主道路；始料未及的政权更迭使得其“本土”官员仍处于政治迷茫中，尚未对国家的政治道路明确方向；甚至有官员表示希望恢复王国体制。<sup>①</sup>此外，利比亚战后数次反复、艰难推进的政权重建和制宪进程也充分证实其重建目标之模糊。

### （三）过渡政权更迭频繁

利比亚的政权重建起始于过渡政府组阁。2011年10月底利比亚正式进入政治过渡期，由战时反对派代表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代理国家权力，一个月后成立过渡政府，原“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局主席阿卜杜勒·凯卜担任过渡政府总理。2012年7月，利比亚举行了该国独立后的首次国民议会选举，由此产生出由200名议员组成的国民议会接管国家权力。至此，在战后不到一年时间内顺利地建立起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但是，此后临时政府的组阁和执政却波折不断，至今尚未稳定。

利比亚过渡政权已历经5位领导人，即：“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贾布里勒、首任过渡政府总理阿卜杜勒·凯卜、两度组阁失败而被迫下台的穆斯塔法·阿布·沙古尔、执政近一年半后被不信任案弹劾的阿里·扎伊丹和执政不足一周就递交辞呈的阿卜杜拉·萨尼。除了总理的频繁更换外，组阁也异常艰难，内阁缺乏稳定性。一则，利比亚国内派别众多，众口难调，组阁艰难。另则，由于政治目标的不同和利益纷争，内阁成员的辞职事件时有发生，以此表达对当前政局的不满。如，2013年5月“政治隔离法”草案通过后，利比亚前国民议会主席穆罕默德·马贾里亚夫以及多名部长及驻外大使辞职；又如，2014年1月，利比亚穆兄会政党中5名部长级成员集体辞职，以抗议扎伊丹执政。当前利比亚又一次面临选定临时政

---

<sup>①</sup> 参见《利比亚外长：我将致力于恢复王国体制》（阿拉伯文），<http://www.alarabiya.net/ar/north-africa/libya/2014/04/06/>.html, 2014-04-06.

府总理及其组阁，依然困难重重。

#### （四）制宪进程步履维艰

制宪，指统治阶级依照一定的原则和程序创制宪法，其实质是统治阶级将自身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并反映到宪法之中。通常情况下，制宪指一种阶级力量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创制第一部宪法的活动。宪法的制定将确立国家发展的方向和轨迹，既是统治者执政的依据，也是国民行为的规范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石。

早在2011年8月，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已公布“宪法宣言”，其中明确规定了具体的制宪进程，即在此后的一年内完成宪法的制定和总统选举。但这个时刻表却由于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安全局势而被一再拖延。直至两年后，临时政府再次将制宪提上日程。2013年7月20日，利比亚国民议会通过制宪委员会选举法，该委员会将负责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首部宪法的起草。由于各种势力的破坏，此次选举无论是选民数量，还是选举结果都未达预期，这使得本次制宪先天不足，未来进程尚难预测。

纵观利比亚政治重建进程，从总体看，战后第一年内基本平稳过渡，政权机构顺利建立，而此后的制宪进程却一波三折。利比亚战后至今的政治重建进程反映出其国内的现实情况为：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越低，2012年7月国民议会选举时登记选民数量为280余万人，而2014年2月制宪委员会选举的注册选民数仅为110万，而实际参与投票人数仅为注册数量的一半；抵制的声音和阻挠的行为越来越强烈。利比亚制宪进程仍然困难重重。

### 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的制约因素

战后，利比亚并未像突尼斯和埃及那样经历线性政治转型轨迹，而是直接由武装革命转型为精英主导的政府。这导致并没有出现任何成功民主转型的因素，即有凝聚力的领导阶层、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一致的民族身份认同，其结果，利比亚饱受政治分裂、社会秩序混乱的折磨，其政治重建必然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 （一）政治发展基础薄弱

内战之前，利比亚政治制度落后，体制残缺，使得其战后政治重建起点很低。独立前，由于复杂的地势、多荒漠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受到不同殖民



者的统治等原因，所辖三地自成一体，各自为政，相互间缺乏联系。利比亚国家的形成不是民族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在殖民列强划定的政治疆域内，被人为、强制地从外部设定并形成的。其结果，利比亚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是殖民主义统治的产物，如地理形状、官僚政治和民族构成等。<sup>①</sup>这种人为形成的、而非自然演进的民族国家在独立后必然产生各种矛盾，如：缺乏国家统一感、本土领导者统治乏力等。在继承了殖民主义遗产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客观条件（独立后形成的民族国家框架和相对正常的国际环境）和主观努力（领袖的人格和才能以及国家的积极政策）的良性互动，才能解决上述矛盾。<sup>②</sup>但利比亚独立后的几十年，无论是主观努力，还是客观条件，都没能使国家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进程。

利比亚自1951年独立至1969年“九·一革命”前处于伊德里斯王朝时期，由原昔兰尼加地区的统治者赛义德·伊德里斯·萨努西担任国王。在此期间，利比亚是一个由3个具有半自治地位的地区行省组成的联邦君主制国家。事实上，在各种内外因的综合作用下，利比亚实现的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原本分裂的状态。伊德里斯国王仅依靠东部昔兰尼加地区的家族、部落维持统治，实行联邦制只是地区间的一种妥协结果，为呈分裂状态的3个地区披上“国家”的外衣而已。从国家内部看，这一时期内三地之间的差异没有减小；民众依然缺乏统一国家归属感；伊德里斯国王的消极治国和禁党令导致利比亚的政治建设裹足不前。从外部看，利比亚脱离意大利的殖民统治后，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是受到多个西方大国的觊觎，伊德里斯国王为获得他们的支持而默许给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联邦政府多次试图改行单一共和制，但都没有实现。最终，石油开发的需要促成利比亚由联邦制向单一制的转变。<sup>③</sup>

1969年，卡扎菲领导“九·一革命”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自此统治利比亚40余年。他所实施的民众国体制，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没有宪法和议会，且禁止组建政党，这与当代世界上通行的政治统治方式严重脱节，以民主之

---

① [加纳]阿杜·博亨主编；屠尔康等译：《非洲通史》（第七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36页。

② [美国]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著，韩志斌译：《利比亚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34页。

③ 韩志斌：《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第105页。

名，行专制之实。卡扎菲执政后期，为应对内外交困的窘境，回归王朝时期所采取的部落统治，依赖其所属的和支持他的大部落打压异己。整个国家充斥着个人崇拜和恩怨情仇，政治现代化进程几乎没有对利比亚产生影响。可以说，卡扎菲对利比亚的统治实质就是独裁统治。

战后利比亚，强人霸权崩塌，国家权威碎裂化，其政治重建须完全重新建制和从头开启制宪进程，没有任何的前期积累和经验可循。不仅如此，战前的政治统治弊端和不良社会遗风的影响依然存在，政治重建须边破边立，起点极低。

## （二）政治清算显现负面效应

利比亚战后无休止的政治清算，迟滞了政治重建进程。

一国政治“变天”后的首要任务通常是对前政权的政治清算，然后创设新的政治制度和构建新政权，利比亚也不例外，战后即开始对卡扎菲政权残余势力的追缴。利比亚战争使得卡扎菲家破人亡，其本人及3个儿子死于战争中，其妻子及另几名子女或至他国避难，或已被捕等待审判。除卡扎菲的家庭成员外，其家族、部落成员、卫队成员以及支持者也都遭到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清算。卡扎菲政权的忠诚支持者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多被杀或被捕，其中包括被称为“卡扎菲的黑匣子”的利比亚前情报部长塞努西、卡扎菲政权的总理马哈茂迪等。战后，利比亚政府还曾要求埃及相关方面移交位于埃及境内的卡扎菲时代的36名高级官员。<sup>①</sup>此外，战后近3年时间里，利比亚境内不断发生针对卡扎菲政权官员的暗杀事件，仅安全部门就有数十名官员遭到暗杀。

利比亚的政治清算并未因对部分卡扎菲亲属和随从身体上的消灭而告终。2013年5月5日，利比亚国民议会以绝大多数票赞成通过“政治隔离法”草案，内容为在1969年卡扎菲革命至2011年2月17日革命期间在利比亚政府工作过的高官应被隔离出当前的政治领域，不得担任要职。该法案的通过和执行可以看作是对前政权的再次政治清算，既显现出临时政府的软弱与无奈，也为本就艰难的政治重建进程再添变数。“政治隔离法”引发的内阁和军队的“大换血”必然导致政府当前工作效率和执政能力的下降，也使利比亚国内面临新一轮的政治分化和权力重新分配。此法的实施对象是曾在卡扎菲统治时

---

<sup>①</sup> 《埃及外交部证实与利比亚当局就移交前政权高官取得联系》（阿拉伯文），载利比亚国家通讯社：<http://www.lana-news.ly>, 2013-10-21.

期长期任职的高官，他们多来自西部地区，这必然使得西部力量受到打压，东部势力大幅上升，从而使得本已有自治倾向的东部地区加快自治步伐。昔兰尼加地区自治政府的成立及其利用“石油武器”掣肘国家经济发展就是有力的佐证。此外，“政治隔离法”的持续发酵所引发的政局动荡对国内安全局势、经济重建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利比亚的政治基础和现实情况看，“斩草除根”式的政治清算在战后利比亚难以实现。卡扎菲以其独特的统治方式独裁统治国家40余年，致使利比亚的统治制度较当代主流统治制度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和缺失。战后，国家濒临分裂，政府权力虚空，社会陷于混乱。当前既没有成熟的体制，也没有强大的党派或领导者能够担起领导国家重建的大任。除曾任职于前政权的官员外，战后新产生的组织及领导者皆无执政经验，无法独立执政。因此，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可能实现彻底“换血”，这就决定利比亚战后的政治清算必然是不彻底的。“政治隔离法”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利比亚陷入彻底政治清算的不现实性与新政府希望“纯洁队伍”的矛盾中，为此频生事端，龃龉不断。事实上，民主最需要的政治远见是放弃清算，同心为国，但这一点在利比亚尚难实现。

### （三）安全环境恶劣

利比亚战后，社会严重动荡，安全形势恶化，暴恐事件频出。一是前政权残余势力仍在不断袭击现政权，复辟之心犹存。发生在苏尔特、塞卜哈的武装冲突多为此类。二是一些战争中的反对派武装不满于既得利益或权力分配的结果，时而挑动事端，抹黑政府形象。如，2012年7月，利比亚首次国民议会选举期间发生在多个城市的抵制选举的恶性破坏事件等。三是不同武装派别、部落间为争权夺利而龃龉不断。此外，极端组织的势力也正在趁势扩大，愈发肆意妄为。2012年9月11日，激进分子袭击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导致3名外交官身亡，其中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利比亚前任临时政府总理称，利比亚正处于危难时刻，当前危机处理的成与败关乎国家生死存亡。<sup>①</sup>利比亚形成如此严峻的安全危局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大量武器散落民间。利比亚战争期间，卡扎菲为发动民众反抗反

---

<sup>①</sup> 《扎伊丹：全体国民都必须将武器藏匿点、基地等上报国家》（阿拉伯文），载利比亚国家通讯社：<http://www.lana-news.ly>，2013-11-21。

对派的颠覆行动和抗击外来武装干涉以捍卫其政权，将武器库中储藏的武器分发给普通民众。导致利比亚战后武器散落，人人拥武，增加了社会中暴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临时政府已经开始解决这一问题。2012年9月，临时政府通过电视广告鼓励民众上交武器，千余人交出了所持有的枪支、弹药、导弹发射器甚至坦克。<sup>①</sup> 2012年12月30日，利比亚当时的内政部长和陆军总参谋长前往班加西了解武器回收情况，并宣布将有计划地在该地区展开检查并没收武器，平民携带武器将受到24小时的监视。<sup>②</sup> 此后临时政府还采取过其他一些相关措施。但是，以上方法在当前几乎人人拥武的利比亚可操作性不强，武器回收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正规军力量孱弱。由于卡扎菲统治时期对正规军缺乏信任，重视民兵和外国雇佣兵，利比亚正规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十分薄弱。战后，国家军队土崩瓦解，民兵武装混战猖獗，前者战斗力低下，无力担当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大任。羸弱的临时政府只能依靠战后“拼凑”起来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安全，其中人员混杂，效力低下。当前，临时政府已着手为组建正规军队培训职业军人，英、美、法、意、土耳其等多个西方大国也表示将在利比亚军队训练方面提供帮助和武器装备，但是军队构建绝非朝夕之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再次，极端势力兴风作浪。利比亚战后重建过程中一大显著特点就是暴力恐怖势力的复活。无论是2012年9月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事件，还是2013年10月美国在利比亚境内抓捕到基地组织头目阿纳斯·利比的事件，都已证实确有恐怖分子已潜入利比亚。更为严重的是，利比亚境内一些派别为谋私利与极端分子相互勾结。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于2014年4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利比亚南部地区已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巢穴”，他们在当地集结力量、获得武器、招募新人。<sup>③</sup> 利比亚战后两年多时间里厮杀混战的乱局“吸引”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进入利比亚境内。

利比亚战后至今，暴力事件频发，恐怖分子的进入和发展壮大更加剧了

---

<sup>①</sup> “Hundreds Hand Over Weapons in Libya Campaign”, <http://www.aljazeera.com/news/africa/2012/09/201292916631790143.html>, 2012-09-30.

<sup>②</sup> 《外交部宣布将在国家机构和企业中建立临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阿拉伯文），载利比亚国家通讯社：<http://www.lana-news.ly/ara/news/view/9919/>，2012-12-30.

<sup>③</sup> 《法国：利比亚南部已成为极端分子的巢穴》（阿拉伯文），<http://www.alarabiya.net/ar/north-africa/libya/2014/04/08/>.html, 2014-04-08.

本已不断恶化的安全危局。暴力革命带来暴力思维的延续在利比亚充分彰显，其政治重建所需要的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尚不具备。

#### （四）经济重建困难重重

利比亚拥有居非洲首位的石油储量和位居前列的天然气储量，具有得天独厚的能源经济优势。但其独立后的几十年内，统治者没有充分重视全面的经济的发展，而是使其沦为一个典型的“地租型国家”，陷入所谓的“石油的诅咒”。<sup>①</sup> 战前利比亚财政收入的80%来自于石油出口，战争中及战后石油收入的锐减大大削弱了利比亚的经济基础。

过渡政府执政后以恢复和发展石油产业作为经济重建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石油出口的恢复和发展是利比亚诸方面重建的物质前提和基础。由此，利比亚的重建与发展高度依赖国内各油区的产能和国际油价。当前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利比亚地区间的相互依存性使得国内一些组织和派别将对石油的掌控作为武器，为实现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国家整体的石油产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利比亚的油气田及输送管道散布于多个地区，有些跨区分布，因此，石油从开采到实现收入价值需要地区间的配合与协作。一方作梗，整个产业链即崩溃。战后，一些富油区的民众或组织以停止石油生产、阻挠石油运输为要挟，或为国家石油公司进入其区域作业设置先决条件等，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使得石油能源无法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影响国家的石油收入。当前，利比亚国内派别间的争斗、混战已导致石油产能降至日产不足30万桶的历史最低点。另一方面，国际油价也必然对利比亚的石油收入产生影响。利比亚战后出现的生活物资供应不足、安全形势恶劣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外国公司在其石油领域投资的信心；诸多原因导致的石油减产和原油出口的不稳定也可能带来利比亚原油出口价格的下降。此外，其他产油国的国内动乱以及整体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动荡也必然影响整体国际油价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利比亚的石油收入。

石油收入的减少和政局的不稳定使得其他方面的经济建设也难以启动和开展。利比亚的经济重建既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又受到管理混乱的影响。政治重建需要稳定的经济保障，但当前政治进程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一些派别的不满，他们诉诸石油武器，导致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出

<sup>①</sup> 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126页。

现利比亚的政治与经济重建相互牵制的局面。

### （五）国家凝聚力弱化

利比亚所辖三地间差异很大，且国内部落众多，民众的部落意识、地区归属感强烈。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呈现高压下稳定统一的表象。战后，其强社会弱国家的特性显露无遗，国家的凝聚力进一步弱化。利比亚战后的真实政治是，新的国家领导者取得国家强势地位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水平较低。从地区因素看，利比亚三地间差异较大，民众的地区归属感大于国家统一意识。从部落因素看，利比亚民众的部落意识深重，部落冲突破坏社会稳定，部落特性干扰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利比亚的部落因素与其政治重建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具体体现在前者的分裂性与离散性和后者要求的统一性与集权性之间的矛盾。

综上，地区差异和部落意识导致的国家凝聚力的弱化是利比亚政治重建中的一个阻滞因素。战后政治重建的顺利开展，必须首先认清这一基本国情，并致力于淡化狭隘的部落意识和地区意识，培养国家统一感，增强国家凝聚力。

## 结 语

当前，利比亚政治重建处于新的动荡期，一方面，已履职一年半的临时政府总理阿里·扎伊丹被不信任案弹劾，阿卜杜拉·萨尼接任几日内又辞职。现任国民议会执政期满，因新政权尚未建立而无法按期移交权力，但其延长执政又招致多方抗议。总之，临时政权难稳定。另一方面，制宪委员会在重重阻力下已产生，预计2014年内将制定宪法并举行公投，但已被数次拖延的制宪进程今年能否顺利推进尚难预料，依旧困难重重。政权稳定与制宪是利比亚政治重建进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和重要的内容，二者在当前表现为相互掣肘。而与政治重建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其他相关因素也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其中，安全形势依然恶劣，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已在南部及东部一些地区扎根且有持续扩张之势；石油生产已成为油田和输油港口所在地区武装分子与政府博弈的筹码，其不稳定性显而易见；社会依然处于各种势力的分裂之下，权威分散，秩序混乱。一言以蔽之，当前的利比亚国家乱，重建难。

利比亚重建进程从本质上看就是战后国家的统一与发展问题，关键是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多元民族国家。而多元社会的建立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

条件，即建立在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行为规范和原则的基础之上，同时还必须拥有共同的原则和价值核心。利比亚的新统治者必须从国家的客观国情出发，正确认识当前的重建特点，积极应对，才能建立一种既符合阿拉伯人、又符合柏柏尔人的国民特性，且兼容 3 个地区民众，以此作为全国人民整合的基础，实现多元主义。利比亚政治重建两年多来的坎坷历程证实，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可以用于革命推翻旧政权，但国家的政治重建和长治久安要求现实、理性的应对。

## Analysis of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in Post – Conflict Libya

*Wang Jinyan*

**Abstract:**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is the core issue to establish Liby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fter the conflict. Over the two years since the fall of Gaddafi regime, the process of Libyan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is still in preliminary stage without stepping forward. On the one hand, different regions (tribes) and political forces in Libya constantly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cannot reach a consensus on national construction, system arrangement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llaps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new interventionism of Western countries bring aftereffects of raging domestic extreme forces, social unrest, economic recession and deteriorating security situation. Libyan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conflict depends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among which regime legitimacy, authority establishment and inclusive politic are key factors to measure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outlook of Libyan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is di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will be undergoing with uncertainties.

**Key Words:** Political Rebuilding; Libya; Stabi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